

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商德文 著

中华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说明

本着百家争鸣，丰富文化生活的宗旨，
欢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中华社科名人■
书撰稿。我们尊重作者的著作权，作者文责
自负，本■书编委会及出版机构对于著作内
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中华社科名人■书
编委会

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商德文 著

中华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香港九龙太子道西287号宝堡大厦12楼A)
发行人：冼赞存 (PorTable:852-90479555)
通讯处：香港九龙尖沙咀邮政信箱90792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180千字
2003年7月第一版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 8 8 - 9 7 1 0 7 - 2 - 2

定价：港币56元 (人民币3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献词

打天下靠穷人
治天下靠富人

人在制度在
人亡制度亡

——商德文

法治的真谛是人权
人权加法治等于民主

——徐显明^①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孟德斯鸠

① 徐显明主编：《人权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目 录

序 言

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构想与对策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与基本对策……10

再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 22

三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 32

四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 43

从二元结构看中国 …… 48

关于建立中国政治特区的构想 …… 53

从“非典”型肺炎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57

二、关于公民社会

论公民社会……………60

政府与民众……………69

村民自治……………73

从封闭走向继续开放……………74

三、关于一党制和多党制问题

共产党的和平演变……………77

离散结构与共产党 …… 81

关于多党制问题……………84

四、民主与自由感悟

北大百年感悟 …… 87

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大趋势 …… 90

马克思学派及其门人之争 …… 95

再论马克思及其门人——殊途同归 …… 101

五、接受各国媒体记者采访时的谈话——政治体制

改革与民主化问题

1、1997年8月6日中午商德文教授在接受法新社
记者墨乔先生一行采访时的谈话 …… 117

2、1997年8月7日上午商德文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
记者齐之丰先生采访时的谈话 …… 122

3、1997年8月8日下午商德文教授在接受英国BBC
电视台驻北京分社社长郭艾莉女士采访时的谈话 …… 125

4、1997年8月13日上午商德文教授在接受美联社
电视台记者毛乐天先生采访时的谈话 …… 128

5、1997年8月21日下午商德文教授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
驻北京首席记者詹姆斯·普林格先生采访时的谈话 …… 132

6、1997年8月23日上午商德文教授在接受美国《时代
周刊》驻北京分社社长吉米先生采访时的谈话 …… 138

7、1997年8月22日上午商德文教授在接受日本
《经济新闻》记者秋田浩之先生采访时的谈话 …… 144

8、1997年9月5日上午商德文教授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
司电视台驻北京首席记者盛海盟先生采访时的谈话 …… 149

9、1997年9月11日上午商德文教授在接受美国广播公
司记者、制片人齐托·罗马纳先生采访时的谈话 154

10、 1999年2月19日下午商德文教授在接受BBC英国广播电台记者陈珍珍小姐时的谈话·····	157
11、 1999年4月16日晚商德文教授在接受BBC英国广播电台记者彭成先生关于中国稳定问题时的谈话··	160
六、 中国未来制度的走向分析预测·····	162
七、附录：	
世界人权宣言·····	180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187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8
八、 主要参考书目·····	217

序 言

一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走过了20多个年头的改革开放，现在已进入21世纪，从某种意义来讲，中国又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是向前进、还是向后退，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是个大问题。中国又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选择和机遇。

翻开近百年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一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史。先是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和他倡导的三民主义；后又有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才有了今天。公正地说，共产党人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的功不可没的。也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中，什么事情都与共产党有关系，包括好事与坏事在内。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唯一的执政党。陈云先生说得好，共产党的党风问题是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但是，为什么在中国，贪污腐败之风屡禁不止呢！？尽管法规、党纪也规定了不少，立法监督也有很多。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从现象上看，多数作案者是知法犯法、明知故犯。从统计数字上看，大案、要案，都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干的。从官方披露的材料看，最大的有省部级，甚至个别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民间的犯罪者也大部分与政府官员有关，如邓彬之流。所以，在中国，当前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惩治贪污腐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是，经过我长期地研究和观察，中国目前的这套监督机构和机制是起不了什么大作用的，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就象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认为，必须从体制上、从法制上解决。中共15大政治报告讲得好，要依法治国。我认为，要依法治国，首先是政府官员要执法、遵纪守法。现在，中国社会不是没有法律、法规，而是政府中相当一部分官员目无法纪。因此，要克服这种弊端，就必须在政治领域中引进政治竞争机制。既然我们在市场经济中引进了经济竞争机制，那么，引进政治竞争机制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根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市场经济必须与三权分立的体制相配套。否则，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增长缓慢或者停滞、萧条，甚至危机。所以，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至于搞什么样的三权分立体制，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但是有一条，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由共产党人来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中国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有步骤、有计划、自上而下地有秩序地进行。否则，则会出现天下大乱。我认为，只要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能顺利地进行。为此，我在1997年8月7日曾向中央建议，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都较好，我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出台三权分立式的改革方案是有利的，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古人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二

自幼从军，半路出家从学、从教已40余载，我只作了一件事，就是教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陈先生的高尚人品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人高尚，诲人不倦，从不追名图利，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是一个真正的

人。古人云，名师出高徒。当然，我算不上是什么高徒。但是，我一生中有一个目标：信仰马克思，信仰自由，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这就是我的座右铭。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在建国前后有一种抉择，就是在当时是同美国结盟，还是与苏联结盟的问题。当然，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美国一直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屠杀中国的老百姓；何况从信仰上看，也没有选择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的一边倒的理论，当时，似乎只有一条路，与苏联结盟。毛主席是一个革命家和民族英雄，而且其独立性格特强。他在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曾经反对过斯大林的错误决定，具有反潮流的精神。这种性格正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乏的。中国与苏联结盟，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影响。特别是从1956年之后，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也就是斯大林模式。这种情况发展到1966年的文革期间，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斯大林主义政治模式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思想控制，即意识形态控制。这是中国儒家学派的政治伦理学的翻版，是在当代的变种。这种意识形态控制人、控制社会的方式是与法治国家、与三权分立是格格不入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到了宋朝以后更是如此。苏联在十月国革命前的文化背景是一个具有少量资本主义因素和封建农奴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不发达、具有浓厚的封建农奴制色彩、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等方面二者具有相似性。按照马克思的台阶论思想，在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中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提（基础）的。中国建国后，由于斯大林中央集权模式与毛泽东的大一统思想不谋而合，所以使毛放弃了他所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并且在党内外批判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这种思想可能就是中共的13大、15大都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的渊源。在邓小平的理论指导下，中国人首先认识了中国的国情，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也应当指出，毛泽东、刘少奇当时

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模式是三三制政权，而不是后来搞的斯大林中央集权模式。所谓三三制政权，就是由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平分天下，各占三分之一的席位，所以叫联合政府。在从1956年到1978年的很长的时期中，由于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强烈影响，而使我们对中国的国情并不认识。因此，才导致了許多错误和失误。中国几十年来的教训就在于此。在邓小平去世前，他只是对市场经济模式作了充分的理论论述。他对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也有一些论述，但是在理论上和目标模式上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所以，现在，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进一步发展他的思想，作出新的决择，将改革开放大业继续推向前进。建立法治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建立一个有效地监督机制和制衡系统，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任務。从而，由社会主义二元结构发展模式进入到新的一元结构发展模式。到那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将达到比较发达的阶段，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将大大增强。

三

本书是我从1997年夏至2003年4月期间所撰写的一些论文稿，我把它分为六个大部分：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构想与对策，包括一论、二论、三论、四论政治体制改革与体制比较和对策等七篇文章；二、关于公民社会，包括论公民社会和政府与民众等四篇文章；三、关于一党制和多党制问题，包括共产党的和平演变与关于多党制问题等三篇文章；四、民主与自由感悟，包括北大百年感悟和马克思学派及其门人之争等四篇文章；五、接受各国媒体记者采访时的谈话——包括世界主要的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和报刊记者的采访时的谈话共11篇；六、中国未来制度的走向分析预测。另外还有附录：1、《世界人权宣言》等三个

文件；2、主要参考书目等。

四

本书的出版是一种探讨性的尝试，因为路总是要人走的嘛。如果大家都绕弯子、又不敢说真话，那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损失。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它的批判精神。什么是批判精神？就是对一切过时的、人为的、非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马克思说，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批判。对中国人而言，作为知识分子，其存在的价值最可宝贵的就是他的超前意识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因此，批判就是呐喊与战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其文化背景和建国后他们的遭遇来看，多数人是被整怕了。所以，其批判精神很弱小。当然，这不能全怪他们，它乃是由某种的社会背景造成的。中国自古至今，文化人基本上是沿着一条学而优则仕的路径发展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的文人们一部分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学者或帮凶，而多数人则沦为平民百姓，而不得温饱。但是，正是后者中的一小部分人成为中国人的脊梁柱。在社会的发展中，知识界是最先觉醒的一部分。然而，他们并不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我这本书可能起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不妥之处，请予以批评指正。

一、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与基本对策

现在的中国推行市场化改革已长达20多年之久，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也已达11年。在长达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经济基础由单一的所有制变为多元的所有制结构，而且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外资经济正在以快速增长的态势向前发展。然而，中国的上层建筑和政治体制却基本上未变。从而，产生出政治和经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磨擦和冲突。为此，笔者经过长期研究与探讨，撰写成此文，并大胆地提出了一些理论性、对策性的建议，以供中央和有关决策机构研究参考，不妥之处，请予以批评指正。

一、关于改革的紧迫性

中共15、16大的政治报告中都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并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在中国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已有几起几落，但是从当前中国改革的情况与发展趋势来看，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情况和局面却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基本事实。从国际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东方新兴工业化国家，都经过了由二元结构体制向一元结构体制的过渡或并轨的过

渡期。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定律是：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和多主体化必然要求政治多元化、政治民主化以之与它相配套、相适应。此乃当今时代发展之潮流。

我们当前在改革中，首先要抓主要矛盾，而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才能迎刃而解。而关于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的问题，在认识上却并不统一。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例如，有人认为，当前主要应当抓金融银行体制改革，也有人主张抓下岗、工人失业问题，还有人提出抓人事制度改革等。尽管上述问题都是很重要的社会问题，也应当认真加以解决；但是，重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把它们混淆或等同起来。我认为，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市场经济体制与现行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从理论上讲，正是由于上述二者之间的矛盾与磨擦、碰撞，才产生出种种弊端、腐败现象和违法、违规行为。因此，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加快和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与进程。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1、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论述

（1）马克思关于政治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原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理是我们当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理论依据；

（2）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二元结构的发展模式及其走向的论述。列宁在其晚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中揭示了社会主义二元结构发展模式，即在经济领域中推行新经济政策和市场机制，在政治领域中仍然奉行中央集权制的模式，以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列宁在许多著作、文章和书信（列宁“政治遗嘱”）中，还指出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中的矛盾与冲突问题。

也就是说，列宁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二元结构的兼容性和它的矛盾性、冲突性和磨擦性问题。但是，由于列宁的早逝，以及后来的斯大林模式并没有吸收列宁思想中的上述精华，致使这一理论被束之高阁，弃之不用。而因此社会主义也由盛到衰，走下坡路，陷入误区。邓小平同志在新时代的条件下，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大大地发展了列宁的这一伟大思想。我国从1978年到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这一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们党灵活地运用了这一原理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且发展了这一理论。同样，在今天，如果我们继续从列宁晚期的伟大思想中吸取新的营养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将会取得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突破与社会发展。

(3)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总设计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邓小平恢复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他提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邓小平发展了列宁晚期思想中的社会主义二元结构发展模式，即市场经济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和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既具有矛盾性又具有一定兼容性的思想。不过，由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各种矛盾的交叉，即表现为政治风波的那种现象，致使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中的矛盾性与磨擦性发展了，或者说处于矛盾激化或半激化的状态。这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是可以观察到的。

(4) 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当家作主。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有两条：1) 制度因素，即通过制度变迁，从制度中、新的体制中释放出能量，使GDP增量；2) 通过技术创新，发展生产力。在中国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中，就是按上述思路进行的。但是，发展到今天，通过制度因素发展的可能性已经很小，而根据预测和分析它等于零，或为负数。

(5) 系统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经济人系统经济。而经济人虽有单数经济人与复数经济人之分，但是作为经济人，他是一个多元化系统，即投资主体多元化。与此相适应，经济人在政治上也要求一个多元化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政治系统，以保护其财产和利益。

2、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并轨经验。

如果撇开制度因素，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是走的这条道路。例如，韩国等国也是由二元结构体制走向一元结构体制的。这些国家的国情在二战后的情况，大致上与中国比较接近，即也是由开始的中央集权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过渡到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独立。也就是议会制或总统制和法司独立的政治体制。但是国家的性质不同，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如此，但是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可供我们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加以参考和借鉴，但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有分析有选择地吸收，反对照搬照抄。

三、现行政治体制中的矛盾和弊端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严重滞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即从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第一和第二个经济周期内，其经济运行是正常的，而且经济效益良好。但是，在它进入到第三个经济周期之后，就发生了通货膨胀问题，其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就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种种矛盾与冲突都说明，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的时期，就必须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与之配套和协调地发展。我们说政治体制严重滞后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从时间上看，大约滞后约

两个经济周期，即14年时间（从1989—2003年）。

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连带性。应当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与优点是它的渐进性、改良性和稳定性，即基本上在没有大的社会振荡中的发展与增长。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确创造了新经验、新模式。但是，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好与坏、新与旧，都是相对的、易逝的。连带性既有优点，也有缺陷。在当前，它的缺陷、矛盾和冲突已经在矛盾的总体上、在矛盾的各个主要方面暴露无遗。这恰好说明，当前是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这说明，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且不可坐失良机。

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矛盾和弊端的主要表现：其一，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漏洞以及各大系统之间与子系统之间的无序、半无序和紊乱状态；其二，政府行为的不规范，表现为政府干预过多以及非理性行为；其三，投资体制至今还未摆脱计划经济的阴影，表现为投资粗放型、重复建设与效益低下型；其四，人治大于法制，基本上为人治社会，而不是法制社会，如当官的说了算，首长说了算等等。在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律、法规，也不是没有立法，但是中国社会长期受儒家学派以政治伦理学治天下的潜在影响与4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在中央集权制模式下形成的种种惰性、惯性以及民俗文化背景，使一切都服从于政策、法令，而缺乏法制意识，因而往往不习惯运用法律手段操作。其五，贪污腐败是政治体制衰朽的最突出最明显的一种表现。这是由于东方社会主义之特点及其在演变过程中与亚细亚结构的结合，与毛泽东思想的汇合，以及与儒家学派的政治伦理学合流所派生的产物。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及其封闭性、落后性、人格的不完全性，以及父爱主义的哲学等等，这一切都将会构成未来政治体

制改革的阻力。

历史经验与教训。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政治与经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了文革，为一大批干部平反昭雪，纠正冤假错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提出首先要改革农业体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等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的思想和方针路线。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1992年邓小平同志大胆地提出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这样，中国经过了长达14年的改革探索道路，终于找到了一条走向经济增长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也开始向国际社会开放，并开始向国际社会靠拢。

在80年代末，大约在1988—1989年时期，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曾提出并打算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有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发表了这方面的讲话或作了报告。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和事件，使政治体制改革流产了。中国的事情，的确与外国不同，从历史上看，有的时候本来计划是反左的，但往往由于某些因素的干扰偏离轨道而去反右，例如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就是一例。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原因，大概也与上述同理。总之，这都反映了人治社会的弊病。

当然，由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点，即“摸着石头过河”（陈云语），以及种种复杂的因素，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迟至今日未出台的原因。可以设想，假如邓小平同志今天还健在的话，他也会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及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因为他提出的市场经济体制仅仅是完成中国社会经济腾飞的一个方面。而为其经济腾飞和持续发展，则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出台，否则就会使经济秩序紊乱，乃至使经济发